

閩南文化研究文丛
· 学者文丛

主编 ◆ 苏文菁

世界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十一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

郑有国 刘佑军 曾筱霞 ◇ 著



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

CD-ROM

“十一五”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

閩商文化研究文庫·学者文丛

主编◆苏文菁

世界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郑有国 刘佑军 曾筱霞◆著

CD-ROM



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

世界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作者：郑有国 刘佑军 曾筱霞

责任编辑：金 峰 吴 猛

出品人：林 斌 李大刚

出版发行：福建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 址：福州市晋安区后屿路6号

邮 编：350014

印 刷：福州千帆印刷有限公司

厂 址：福州市南平东路金城投资区新店楼

开 本：16开

印 张：15印张

字 数：250千字

版 次：第一版

印 次：第一次印刷

版 号：ISBN 978-7-900464-06-4/C

定 价：30.00元（本书配合同名光盘同步发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总 序	(1)
世界的中国——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代序)	(3)
导 论	(5)
一、计划经济与新中国的选择	(5)
二、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	(10)
三、计划经济体制在现实中的窘迫	(12)

第 1 篇 农村：中国经济改革的先驱

第一章 困境下的突破	(19)
第一节 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	(19)
一、危机四伏的宏观经济	(19)
二、全面萎缩的微观经济	(23)
三、混乱无序的经济体制	(27)
四、国际视角下的计划经济	(30)
第二节 农村：改革的突破口	(33)
一、农民、农村、农业	(33)
二、从“借地渡荒”到“包产到户”	(37)
三、农村激励机制的构建	(38)
第三节 农民自发改革的反思	(39)
一、危机下农民本能的破坏勇气	(40)
二、农民利益的表达机制的缺失	(41)
三、小结	(43)

第二章 农村经济改革的方向与探索	(46)
第一节 农村经济改革的引导	(47)
一、“包干”制度的激励效果	(47)
二、从“实践”再到“理论”	(49)
三、“摸着石头过河”	(50)
四、三个“一号文件”	(51)
第二节 农民经济中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53)
一、农业生产主体地位的巩固	(54)
二、产品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57)
三、要素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	(60)
第三节 农村经济改革领域的突破	(62)
一、非农领域的改革	(62)
二、乡镇企业的发展	(65)
三、影响深远的两种发展模式	(67)
第四节 小结	(70)

第2篇 战术预备期：“点状”推进

第三章 改革重心的转移与推进	(77)
第一节 改革重心的转移	(77)
一、改革基调的形成与确立	(77)
二、城市经济改革重心的确立	(79)
三、改革重心转移的深层原因	(80)
第二节 推进改革的基本要素	(82)
一、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	(82)
二、经济改革的渐进式路径及其“点状”特征	(83)
三、比较优势原则下的非均衡思路	(85)
第四章 区域经济发展思路	(87)
第一节 经济特区：资源配置的新方式	(87)
一、经济特区的设立	(87)
二、创立经济特区的战略剖析	(90)
三、经济特区的开创性意义	(92)

第二节 特区经验的全面推广·····	(95)
一、特区经验的启示·····	(95)
二、对外开放空间的逐步推进·····	(97)
三、全面开放的实绩评价·····	(98)
第三节 非均衡的区域经济概貌·····	(102)
一、从均衡到非均衡的转变·····	(102)
二、非均衡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	(103)
三、非均衡区域经济格局的简要评价·····	(104)
第五章 比较优势原则下的产业非均衡演进·····	(107)
第一节 产业发展战略的转变·····	(107)
一、产业发展环境的转变·····	(107)
二、开放条件下的产业非均衡发展战略·····	(109)
第二节 战术预备期的产业非均衡概貌·····	(111)
一、非均衡的产业政策·····	(111)
二、非均衡的产业结构·····	(113)
第三节 产业非均衡演进的绩效与方向·····	(120)
一、产业非均衡演进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20)
二、产业非均衡演进的积极意义·····	(122)
三、产业结构非均衡演进的基本指向·····	(124)
第六章 “体制”与“体制外”的突破·····	(127)
第一节 私营经济存在的确认·····	(127)
一、私营经济发展的背景·····	(127)
二、私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130)
三、私营经济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133)
第二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行·····	(135)
一、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外压力·····	(136)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回顾·····	(138)
三、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成就及其潜在的深层问题·····	(142)

第3篇 战略布局期：全面开放

第七章 上海经济的崛起及其模式·····	(147)
----------------------	-------

第一节	上海经济重新崛起的背景	(147)
第二节	“上海模式”的政府驱动型增长	(149)
第三节	“上海模式”的投资驱动型增长	(151)
第四节	“上海模式”的反思	(155)
	一、“上海模式”形成政治经济逻辑	(156)
	二、政府驱动型增长的失灵	(157)
	三、投资驱动型增长的不可持续性	(158)
第八章	西部大开发的探索	(160)
第一节	东、中、西部的区域经济差异	(160)
第二节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践	(163)
	一、西部大开发与社会主义的取向	(163)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部署	(164)
第三节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绩效与思考	(165)
	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经济成就	(165)
	二、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问题	(168)
	三、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思考	(171)
第九章	弱性非均衡产业结构的演变逻辑	(174)
第一节	中国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演进规律	(174)
	一、产业结构的非均衡演进规律	(175)
	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两种演进模式	(176)
	三、比较优势原则与中国产业结构弱性非均衡的形成逻辑	(176)
第二节	中国外贸结构分析	(178)
	一、外贸出口产品的主要构成	(179)
	二、加工贸易是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式	(180)
	三、外资企业是出口贸易的主要经济实体	(181)
	四、外贸出口市场分析	(182)
	五、小结	(183)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非均衡演进的构想	(184)
	一、选择错位发展路径	(184)
	二、加强高级要素积聚	(185)
	三、发挥后发优势	(187)
	四、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回归	(188)

第四节 一种经济结构非均衡演进模型分析·····	(190)
第十章 全面市场化改革及其困惑 ·····	(193)
第一节 国有企业“双重人格”的困惑·····	(193)
一、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的严峻形势·····	(193)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思路：市场化·····	(195)
三、“双重人格”：国有企业市场化后的尴尬·····	(197)
第二节 医疗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困境·····	(201)
一、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历程简述·····	(201)
二、医疗市场化改革的困境·····	(203)
三、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成与败·····	(205)
四、小结·····	(207)
第三节 教育产业化实践及其若干问题·····	(208)
一、教育产业化的提出与实践·····	(208)
二、教育产业化与公共目标的背离·····	(209)
三、小结·····	(211)
第四节 树立新的经济改革观·····	(212)
第十一章 经济后发中的政府、制度与经济长期增长 ·····	(215)
一、后发优势与经济赶超路径的选择·····	(215)
二、政府推动与经济后发优势的实现·····	(217)
三、制度陷阱：经济长期增长面临的约束·····	(220)
四、制度缺失与制度软化条件下经济系统不稳定的再分析·····	(222)
五、小结·····	(224)
附 录 中国经济改革三个阶段主要思想及其相互关系 ·····	(225)
后 记 ·····	(227)

总 序

福建是中国历史上实现对外交流的主要区域，是中国海洋文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闽商是海洋文明的杰出代表。对闽商及其所代表的海洋文明的研究既是恢复人类历史原貌的需求、也是为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寻找本土文化资源的努力，更是在重建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的话语权。国际化的闽商值得全球学者的关注、需要全球性的研究视野。

闽商既是区域性课题，其所代表的精神是福建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文化支持；又是全国性的课题：海洋文明是今天中国发展的内在文化资源；闽商更是全球的话题，历史以来，闽商的发展早就构成世界文明史的一个部分。闽商文化研究是我们展现多样性中华文明的重要文化建设，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今天的闽商祖居地愿意成为世界学术界研究闽商的重要区域，这是我们策划出版“闽商文化研究文库”的动因。

近年来的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还表明，福建是“南岛语族”的重要发源地。长期的对外交往与商业活动不仅为我们遗留了大量的文献，内容涉及福建人在世界各地的生活、海外交通的历史等等；而且，西方许多国家也将“福建”作为了解中国的窗口，他们以不同的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写下了他们眼中的福建。这些文献无疑都是我们今天认识福建、建设海峡西岸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我们的“闽商文化研究文库”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1. “学者文丛” 当代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成果。从海洋文明的视野来研究闽、闽文化与闽商、在世界文化的汇流中来审视闽、闽文化与闽商、在人类具有的普遍性原则下言说闽、闽文化与闽商。

2. “海外汉学文丛” 译介海外汉学家关于福建、闽商研究的专著。海外不同时期、不同文字、不同视角记载的福建是福建人认识自我、理解世界的重要角度。由于海洋文明以及相关的商业文化在中国主流话语中的长期边缘、失语与扭曲的状态，借海外汉学的视野无疑为闽商认识自我提供另一个角度。

3. “经典文丛” 整理、校注福建历史上有关海外交通、贸易等方面的书籍。该文丛的整理出版一方面提供了传统以来闽商经商之广阔的世界版图；另一方面为世界文化交流、移民、贸易、考古，以及人类各文明盛衰提供闽商的历史见证。

4. “闽商年鉴” 整理省内、异地闽商与海外宗亲社团的相关资料。对闽商的基本资料进行由易及难、由今到古的收集与整理，一方面为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较为准确的数字；另一方面铭记闽商的发展历史，为研究者与当事人提供一份“年鉴信史”。

5. “传记文丛” 闽商人物与闽商企业实录。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包括闽商在内的中国企业与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文化的总结；他们有更多的经验与教训需要书写。书写的过程就是一种总结与批判的经历。今天的闽商在未来如何发展依赖他们如何看待、总结自己的昨天。

近 30 年来，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变化是举世瞩目的；其中，中国东南沿海无疑是推动这种变化的核心区域。其实，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由于中国东南沿海经济与海外贸易的繁盛，该区域不仅是世界经济的枢纽、世界文明的交汇地；而且也是考量多样性中华文化、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自 8 世纪的唐中叶以来，中国的经济中心就开始逐渐向东南转移；千年前的宋代已将“开洋裕国”作为国策、海外贸易经济的比例愈来愈大；五百年前，欧洲人怀揣着对中国财富的期待开始远航；而此时的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了对海洋贸易可能产生的财富的兴趣；以福建（简称“闽”）为代表的中国东南区域的民众以各种形态继续海上的贸易活动，并由此产生了海外华人的“离散族群”。这种官方与民间选择的对抗，终于导致了 150 年前大清政权败在两千多名印度雇佣军的火炮之下的结局。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现实的需求来看，“闽商文化研究文库”都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交流与建设的园地！我们相信海内外的学者有足够的兴趣、从不同学科的学理出发，来抒发、探讨以闽、闽文化与闽商为核心的各种问题。是为序。

“闽商文化研究文库”编委会

2008 年 12 月

世界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

(代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GDP 总量从 1978 年的 3645.2 亿元增加到了 2007 年的 246619 亿元，人均 GDP 也已经进入了 2000—3000 美元区间，国民经济进入了关键性发展阶段。“入世”五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取得了巨大成就，GDP 总量已经位列全球第四；进出口贸易额跨越了 2 万亿美元，2007 年达到 21738 亿美元，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由 2001 年的 3.9% 增加到 2007 年的 6.7%。海关总署近日公布今年 1 至 9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情况。据海关统计，1—9 月我国进出口总值 19671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同）增长 25.2%，其中出口 107406 亿美元，增长 22.3%；进口 89307 亿美元，增长 29.0%。同时，实际利用外资平均每年近 620 亿美元，累计实际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5784.26 亿美元。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在 1—9 月全面快速增长。据海关统计，1—9 月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值 32252 亿美元，增长 25.9%，高出同期我国总体贸易发展增速 7 个百分点。美国为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为 25150 亿美元，增长 13.8%。日本为第三大贸易伙伴，中日双边贸易总值为 20269 亿美元，增长 17.8%。此外，1—9 月我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值为 18041 亿美元，增长 22.9%，东盟上升到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印度为我国第十大贸易伙伴，中印双边贸易总值为 4205 亿美元，增长 54.9%，发展速度位于前十大贸易伙伴之首。

伴随着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成长引起了西方世界的警惕，担心中国经济的发展伤害了他们的利益，“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能源消耗惊人、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形成了对生存条件的一系列冲击，也实实在在地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 13 亿中国人的问题。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需求市场，不断增加的进出口额，乃至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都势必对亚洲和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也不应该只是站在中国本身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由于中国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质，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引起世界的关注，牵动着世界各国的神经。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站在消极的角度来看待各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关注，要能够从周边各国的歧义中超脱出来，冷静理性地总结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积极与消极的因素，承担起中国对世界所应当负起的责任。

中国经济历来就不只属于中国，中国经济的改革也不仅仅是中国本身的问题，中国是属于世界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在于自身的意义，更在于其对世界经济影响深远。因此，中国经济改革一开始就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也要求我们从世界的经济发展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这 30 年的历程。

导 论

30年前开始的中国经济改革，从近的说，是对1949年以来实行的经济政策的修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新中国诞生后首先面对的是“二战”后的世界冷战格局，特别是西方各国充满了对新中国体制选择的疑惑和不安，因而加强了对新中国的封锁和包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新中国的外交选择不得不走上了孤注一掷的“一边倒”。在国内，新中国面临着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探索一条与中国具体国情相协调的经济建设道路，如何使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上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并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和争取共产主义崇高目标的最终实现，这些都成了迫切的现实问题，摆在了新中国的面前。从1949年到1976年，中国在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与当时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陷入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困境中，几经思索也难以冲破高度集中体制所带来的樊篱。对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以及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探索，不仅有其现实的国际因素，更有其深刻的本国文化选择。

一、计划经济与新中国的选择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即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在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必将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以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市场导致的种种自由主义的缺陷都将得到消灭，从而克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基本矛盾，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

然而，迄今为止，存在与曾存在的社会主义政体都不是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产生于经济高度发展的地区，它们并不是由资本主义的

基本矛盾无法协调而催生的。总体而言，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其如马克思论述的是经济发展的逻辑结果，不如说是社会多种矛盾激化的选择。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本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根本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方式，整个国家的意识甚至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牧歌式的憧憬中。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已经进入了如火如荼的工业化阶段；更有不少国家却仍然处于经济发展相对低级的阶段，甚至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因而，贫穷社会中绝对平均主义的愿望容易和马克思的经济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理想相重叠。

考察近代中国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当时社会的三大矛盾是封建地主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中国人民首先需要考虑的不是在经济富裕满足的前提下寻求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如何解决作为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存权问题。在近代中国，多种矛盾的冲击和激化，使得多种思潮泛滥中华，都在寻求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最为关键的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从俄国的革命实践中受到了历史性的启示，并找到了解决近代中国问题的途径。这一途径选择的最终结果是，决定用革命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使一切的思考最后有了结论，中国革命史开始奏响了新的乐章。

作为这一革命的核心代表，一代伟人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和一段时期内经济建设的主要表现。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的将来纲领和最高纲领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更为重要和合乎我国国情的是，“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1]所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经济建设的最初7年（1949—1956）里，积极地允许和利用了包括公有和非公有性质的五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在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还分别对这五种经济成分给予了明确的定义：“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都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2]

实际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当时社会经济现状的认识是正确的；在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中，是认真负责的。对多种经济形态的承认与保留，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的正确认识之上的。共产党人也已经明确认识到：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得不经的一个阶段，是为了实现向社会主义经济过渡所必经之路。应当说，这种思考是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最新的诠释。

非常不幸的是，这个阶段很快消逝。随着“三大改造”的结束，只经过7年的过渡，到1956年就明确确立要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挟朝鲜战争胜利的余威，中国共产党认为可以顺利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开始建立起一种以高度的权力集中为特征、以行政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从苏联拷贝到东北解放区，后经全面的人员培训和机构设置，特别是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的运行实践，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全面形成。这种经济体制构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79年近二十年的主要经济体制。我们称之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3]

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实践，转眼间就能转入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轨道上并且难以自拔了呢？关于中国选择计划经济的原因，学界的看法分歧很大，有代表性的是这么几种：第一，有计划的经济最初是为了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基本矛盾而提出的构想，但在实践中，计划经济体制却被中、俄等落后的前工业化国家用做一种工业化赶超手段，主要原因是计划经济强调宏观效率，对于落后国家有巨大吸引力；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具有中央权威政府传统，比较容易形成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所必需的资源配置中心。从计划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形成来看，它在本质上仍然是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积累的一种手段。^[4]第二，中国经济体制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就经济运行来说，经历了一个由计划与市场并存向计划经济转变，再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中国在50年代之所以选择计划经济体制，除主观认识因素外，当时的工业化压力、资源短缺和政府动员能力强也是重要因素。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后的20年里，尽管它在集中资源加快独立工业体系的建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基本保持了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但是它最大的缺陷是不能长久实现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高效率，而这正是计划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的真正原因。^[5]第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中国当时内外部环境、

条件的必然选择，其本身暴露出来的问题必然引发变革。变革过程不可避免地纠缠着变革与维护的矛盾，体现于其中的焦点就是对计划和市场调节关系的思考与取舍。对计划经济体制的评价要历史地来看待，只有从历史的进程中认识和思考，才能坚定现实的选择。^[6]

今天，结合当时我国国内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以及所处的特殊国际背景去综合考察，我们进一步认为：

首先，经过长期战争之后的国内经济一片狼藉，迅速恢复经济的要求需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连年战争，中国经济水平急剧下降，1949年的经济水平与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年份相比，农业总产值下降20%以上，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以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工业产量也大幅下降，钢年产量仅为15.8万吨，比历史上最高产量年份（1943年）减少了82.9%，年原煤产量由6188万吨下降至3243万吨，下降47.6%，棉纱由245万件下降到180万件，下降26.5%。1949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工业为30%，而现代工业产值只占17%。工业布局极不合理，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沿海，内地只有不到30%的份额，铁路只有2.2万公里，能通车的不到一半。全国现代化的货物周转量只有229.6亿吨公里，仅达战前最高水平的42.7%。^[7]在这种背景下，党及时将工作的重心从军事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需要加大对经济的控制力度，也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具体工作中，一方面，通过没收和改造官僚资本家的工业，加快对没收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以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另一方面，针对短缺、萧条经济下出现的投机行为、扰乱经济秩序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因可以说，自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工作开始，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就进入了萌芽阶段。经过两年经济恢复，以及在此期间进行的生产关系调整（如没收官僚资本、调整公私关系）和统一财经、稳定物价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形成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8]

其次，实现较高度度的工业化，建立健全、独立的工业体系是任何一个独立国家都在追求的目标。无疑，工业化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悟出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一真理的中国人一致认同的观点，也是新中国领导人为了实现富民强国的伟大目标。但是，我国当时的工业基础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按当时的标准看，现代工业也只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将近90%的人口在农村生活和就业。^[9]这仅仅是国内

经济环境恶劣的最粗概貌，在国际上面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环境更为恶劣。自新中国成立伊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封锁和制裁中国；在军事上，我们加入了朝鲜战争，又与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处于对峙状态。要进行工业化就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本就满目疮痍的国内经济体显然不足以在市场或自发的基础上为工业化提供充分的支撑；国际环境的制约也使得新中国只能与苏联及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进行经济往来，获得极其有限的支援和帮助。既然市场机制不足以发挥作用去支撑工业化的进行，也无从外援以提供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和技术支持，那就只能从国内经济体内通过加大自身积累增强“造血功能”。这种选择必须背离市场机制的作用，扭曲市场价格信号，通过非市场的规则来实现有限资源最大限度地流向工业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经济建设用心一致、对资本主义思想充分警惕和对共产主义极为憧憬的条件下，这种设想在当时是可能的，而且也是令人充满信心的。而当时被认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功的苏联，正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短期内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在重工业、军事工业方面成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劲对手。所以，战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经济建设，我国也未能完全置身于外。

最后，在意识形态上，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体制、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占据了绝对主流地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经济建设的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逻辑上充分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必将胜利，并且设想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用计划机制代替市场机制，这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的社会化的矛盾，因而是最有效率的。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其理论和思想是无人可以挑战的，这就成为了我国建立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源头和理论依据，这实质上为后来一些教条的理论家对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充分解释。

显然，这种选择不是偶然的，除了经济因素外还有其深刻的文化渊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明，留给人类的不仅是享用不尽的财富，也在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集权制以及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从这个社会中走出来的任何一个有识之士也很难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几万万的中华儿女更难以一下从中彻底解放自己的思想。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社会传统文化背景下，虽然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社会思